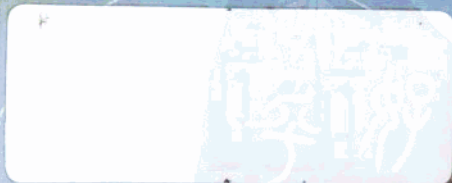


厦 门

轶 闻
YI WEN

史话实录

常 家 祐 著



目 录

名 人 轶 事

- 鲁迅林语堂与厦门薄饼 (1)
- 郭沫若在厦门考察郑成功史迹 (4)
- 郁达夫访厦行迹拾遗 (8)
- 丰子恺访厦往事琐谈 (12)
- 陈嘉庚矢志兴厦大 (16)
- 拳拳赤子心 浓浓管鲍情
——高云览与张楚琨的友谊 (20)
- 陈从周教授的厦门情 (25)
- 陈应龙被称为“陈半仙”的由来 (29)
- 弘一法师学英语 (32)
- 协助林尔嘉与洋人打官司的律师是谁 (34)

小 城 遗 闻

- 万人空巷争看“美人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厦门泳坛盛会纪趣
..... (40)
- 文化宫前续话古今 (43)

城内马房口一段小史	(46)
钟楼沧桑	(51)
华侨黄重吉投资办厂忧喜录	(54)
林语堂曾就读的寻源书院	(58)
寻源书院迁出鼓浪屿之后	(61)
陈起吾父子与海疆学术资料馆	(66)
厦门早期风味小吃街——妙香路	(70)
金厦海域两太武	(73)
海上明珠浯屿岛	(77)
送瘟神 迎春光	
——厦门解放前后的记者生活漫忆	(78)

交 通 史 话

厦门最长的马路	(83)
厦门早期公共交通事业	(85)
厦门长途客运的变迁	(87)
陈嘉庚与同美汽车公司	(89)
福厦公路变奏曲	(91)
嵩屿修建铁路旧话	(95)
修建高集海堤缘由	(98)
陈嘉庚倡建杏集海堤	(100)
移山填海的创举	(102)
火车驶进厦门岛	(104)
厦门港的兴起	(105)
厦门码头的建设和发展	(107)

和平码头沿革	(109)
东渡港的崛起	(111)
厦门的外海航运	(113)
解放前垄断厦门海运的外轮	(115)
繁盛一时的内海航运	(117)
历史上的海难	(119)
“便利”轮翻船	(119)
“万福士”轮遭劫	(120)
“中兴”轮惨案	(121)
厦门沦陷时期海上交通一瞥	(123)
金厦两门直航回溯	(125)
厦门机场演变	(128)
厦门前期民用空运	(130)
昙花一现的航空学校	(132)
陈文麟长途驾机飞厦	(134)
 主要参考书目	 (136)
后记	(137)

名人轶事

鲁迅林语堂与厦门薄饼

厦门薄饼,又称春饼、春卷,是厦门颇具特色的风味小吃之一。这一道与厦门民间节俗有密切关联的名点,因机缘巧遇,有幸被二十年代曾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文化名人鲁迅和林语堂赏识,并被文字记载流传,既可供后人谈助,亦为名品增色生辉。

1926年岁末,鲁迅将离开厦门大学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前夕,曾应同事邀请尝了一顿薄饼宴。据《鲁迅日记》1926年12月31日载:“晴。午周弁明招食薄饼,同坐有欧君、矛尘及各夫人。……”周弁明系周辨明之误,当时任厦门大学总务长。矛尘即章廷谦,笔名川岛,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矛尘后来在他写的《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一文,记述了他和鲁迅一道参加这次宴会有趣的情景。那天他们宾主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开始

时和通常的宴会差不多，喝酒吃菜，只是主妇没有来，空着一个座位。后来主妇来了，春饼也来了，由主妇包好了送给大家吃。其中佐料很多，很好吃。“包得很大，我和鲁迅先生都只得用两只手捧着来吃，分左、右、中三次咬，才吃下一截去。”第二个春饼又从主妇手上递过来了，“比第一个还大，几乎像一个给婴儿用的小枕头。我和鲁迅先生还是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中间再咬一口地勉强把它吃下去了，当第三个比小枕头还要大的春卷送过来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道谢。”

厦门薄饼有个别称叫“夫人薄饼”。据说，薄饼是明万历年间同安人蔡复一夫人首创。而厦门薄饼因制法有独到之处，声誉鹊起。家庭食用时，一般由主妇包制，要包得大而不破，可用几张饼皮拼起来包，包得越大越显本领。有的人家还用这种方法测试新娘子的手艺。那天主人为名教授饯行，主妇盛情款待，因而包卷的薄饼特别大，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但鲁迅并不因此犯难，且留下美好的回忆。矛尘说，“这样厚意而亲切的招待，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不但‘醉酒’，而且‘饱德’，一直过了多少年之后，鲁迅先生和我还记起当时彼此用两只手捧着一个枕头咬的场面。”

比起鲁迅，林语堂吃厦门薄饼的机会多得

多。厦门薄饼是林语堂家庭饮食的“保留节目”，过年过节都吃。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出身于鼓浪屿富商之家，烹饪技术高超，曾与其三女儿林相如合著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两本书，前者还获得德国烹饪学会颁发的奖状。她制作的美味可口的厦门菜，使林语堂赞赏不已，他告诉家里人，吃饭做菜之类的事，大家都要听从夫人安排。

林语堂家里常吃厦门炒米粉、红烧猪脚、猪脚面线、焖鸡，等等。但据林语堂次女林太乙回忆：“在厦门烹饪中，没有什么比薄饼好吃的了。”原来，她们家里包薄饼的料子相当丰富，有“猪肉、豆干、虾仁、荷兰豆、冬笋、香菇，样样切丝切粒炒过，再放在锅内一起熬。”熬的时候要控制好火候，“料子太湿，则包起来薄饼皮会破，太干没有汁，也不好吃，太油也不好；熬得恰到好处，要几个小时。”她们吃的时候也很讲究，“桌上放着扁鱼酥、辣椒酱、甜酱、浒苔、茼蒿、花生末，还有剪成刷子般的葱段，用来把酱刷在薄饼上。包的时候，先把配料撒在皮上，然后把热腾腾的料子一调羹一调羹放上去。”如此齐全的主料和配料，加以精工制作，其效果自然不一般。林家次女以美食家的姿态回忆说：“吃的时候，用双手捧着，将薄饼送到嘴边……一口咬下去，有扁鱼的酥脆，花生末的干爽，茼蒿的清凉，浒苔的甘香，中

心的料子香喷喷，热腾腾，湿湿油油烂烂，各种味道已融合在一起，实在过瘾。天下实在没有什么比薄饼好吃的了。”（《林语堂传》）

如今厦门薄饼虽然已从街头巷尾的小食店、食摊，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宾馆、酒楼宴客风味名点，且于新近荣登“福建名小吃”榜上，但能懂得按传统食法品尝薄饼的，恐为数不多。

林语堂一家 1936 年由上海迁居纽约后，厦门薄饼仍是他们逢年过节的上桌佳肴。后来林语堂的三女林相如学会了自己烙薄饼皮，成为她母亲烹制这道乡味美食的得力助手。

1998 年 10 月

郭沫若在厦门考察郑成功史迹

今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 338 周年。38 年前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00 周年之际，正在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的郭沫若先生，曾来厦门考察郑成功遗迹和文物。

通常，人们都知道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其实郭沫若祖籍是福建宁化，他曾撰文述及自己的祖籍。郭老生前只到过福建两次。第一次是 1927 年秋天，江西南昌“八一起义”以后，他随起

义军从瑞金东行进入闽西。那时他在军中主持政治宣传工作，曾在汀州、上杭一带活动。第二次是1962年冬，先后到了福州、南平、武夷、莆田、泉州、石井、安海等地，而后来到了厦门。

厦门是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根据地，其历史遗迹遍布厦门本岛和毗邻地区。鼓浪屿日光岩有郑成功屯兵扎营的龙头山寨、阅师水操台遗址。郭沫若于1962年11月15日抵达厦门，住在鼓浪屿日光岩下的干部招待所，次日便兴致勃勃地登上日光岩。他瞻仰了龙头山寨和水操台，观看历史名人凭吊郑成功的题诗石刻，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缅怀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登日光岩》一诗：“晃崖磅礴沐天风，屹立鹭江第一峰。音乐名区联蜃市，英雄故垒看艨艟。金门销定瓮中鳖，铁轨飞驰海上龙。昨日荷夷今日美，驱除待命有先锋。”

随后，郭沫若来到位于日光岩北麓的郑成功纪念馆。此馆于是年1月28日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时正式开馆，郭沫若对它并不陌生，因他曾应该馆约请，写了一首题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的诗。他仔细参观了馆中的陈列品。为了看清楚挂在墙上的一幅郑成功画像上王忠孝题的“百字赞”字迹，不顾70高龄，站到靠背椅上辨认细读，还就其中若干疑点，虚

怀若谷地与馆里工作人员交谈切磋。郭老在陈列室中看到上面提到的他为纪念馆题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一首诗字迹较小，过了几天，便重写了一张大幅的，送给纪念馆，并为纪念馆写了馆匾和“开辟荆榛 千秋功业”，“驱除荷虏 一代英雄”的对联。

纪念馆里存有一种古银币，正面上端有“漳州军饷”四字，下方有个草书花押，背面是“足纹通行”四个字。这是一种珍稀银元，历来为收藏界和学术界所重视。漳州民间称它为“郑成功大元”，这是漳州中学教师、热衷搜集、考证古文物的李冬雨，在漳州民间为该馆征集到的。因钱币上没有铸明年代，又兼史料失载，无所依据，该馆没有把它作为展品陈列。这枚银币引起郭老的浓厚兴趣，经一番鉴别，他初步判断银币上的花押显然是“成功”二字的合书。应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要求，即席写了五言绝句一首：“故垒想雄风，海天一望中。漳州军饷在，二字署成功”。此后，他又两次独自到纪念馆，就这枚银币的有关问题，与馆里工作人员作进一步的探讨。后来郭老访问厦门大学，与有关教师座谈时，说到“郑成功大元”，在座的历史系陈文松副教授发言时指出：“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郭老认为这个补充很重要，非常高兴，当即与陈文松亲切握手表示敬意。原来，明朝皇帝姓朱，郑

成功曾被南明隆武帝(即唐王朱聿键)赏识,赐他国姓,即被赐姓朱,所以郑成功也可称作“朱成功”。由此可以认定银币为郑成功所铸。后来郭老回北京经过上海时,曾再作一番考察。他在一家古玩店看到另一种“漳州军饷”的银币,其正背面的铸字与在鼓浪屿看到的一样,只是花押不同。经仔细分析,是“国姓大木”四个字。“大木”是郑成功的号,所谓“国姓大木”,其含意就是“郑成功”。郭老回到北京后,又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反复考证,写出了题为《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等两篇论文,认为“漳州军饷”银币乃清顺治六年至九年(公元1649年~1652年)郑成功抗清进攻漳州时所铸。把原先认定的我国自铸银币的历史从清道光年间推前近两百年。不过,自郭老的论断提出后,有一些钱币专家学者曾就他的论断进行讨论,有赞同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由于都是推理判断,没有说服力强的突破性结论,“漳州军饷”的铸造年代和背景之谜,尚待揭开。

郭老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已于1963年完成。他以充满爱国热情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当年郑成功统帅大军渡海东征,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历史风云。全剧共10章,剧情就是由郑成功在鼓浪屿的军旅生涯展开的。剧

本先发表于 1963 年北京《电影创作》，其后于 1979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2000 年 3 月

郁达夫访厦行迹拾遗

厦门日报副刊《海燕》7 月 20 日发表的赵家欣先生的《追叙往事忆达夫》一文，忆叙郁达夫抗日战争前夕访问厦门时，作为记者和爱好文艺青年的赵先生，前往采访并陪同游览、访问的若干往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郁达夫当年访问厦门的一些活动情况。郁达夫于抗战前后两次经过厦门，第一次虽只停留三天，但活动内容相当丰富。第二次只在离厦岛半里的海轮上逗留一日，没有登岸，却留下了一段洋溢着爱国情怀的心声，发人深省，因而，对他两次经过厦门的行迹作些补遗记叙，当不无意义。

郁达夫首次访厦，是他访问日本后，绕道台湾返回福州途中，顺道作短期逗留的。郁达夫访日，对外说是去购买印刷机，实际上负有秘密使命，即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托，向亡命日本已十年的郭沫若转达要他伺机回国的意见。当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便由上海启程赴

日。他于1936年12月30日乘坐福建丸轮船抵达厦门,当日便在他寓居的天仙旅社接受各报记者采访。在回答《星光日报》记者提出的问题时,他说:“鲁迅的死是可惜的……他死了,使我们明白,无论任何一方面都需要一个领导人物,像一个路标指出一条路给我们跑。”他对鲁迅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死深表惋惜。郁达夫抵厦前一个月,厦门进步文化团体举行了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会上通过了由闽南文艺协会等七个文化团体提出的改厦门大学路为鲁迅路等三个议案。当他知道改鲁迅路的议案尚未被采纳时,便于抵厦次日在出席厦门市市长为他举行的午宴时,力争此事。因国民党市党部有人反对,没有成功。

郁达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他路过台湾及与各方面接触见闻。他颇有感触地说,台湾人无论老的少的,对祖国都很热爱。但在统治者多方面的压迫防范下,他们的思想言论不自由,三五个人在马路旁说话便要受干涉。日本人想尽法子使他们忘掉与中国的关系。在回答《江声报》记者关于台湾文学情况的提问时,他说:“台湾一般文学青年均能埋头苦干,努力写作,惟多甚苦闷,盖政治高压,发表言论困难,且汉文基础薄弱。而日文方面,也因所受教育,与日人待遇不同。故日文作品,亦未能与日人并驾齐驱。职是,中日文学写作,皆未见优美。不过将来甚有

希望。”他的话言简意赅，表达了他对台湾同胞深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郁达夫访厦期间，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其中的佛门高僧弘一法师，他仰慕已久，早已怀有造访的心愿。这次拜访，虽然谈话不多，但法师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清癯如鹤，语言如银铃，动止安详，仪容恬静。言谈虽只一句两句短语，却殷勤至极，使人入耳难忘。他十分珍视这次会晤，认为弘一法师是他所认识的出家人中，最严守戒律，注意于“行”的一位。回到福州后，他很快便寄赠一首抒怀诗，表达衷情。通过这次见面，他与弘一法师建立了友谊，并有几次交往，如托弘一法师代订《佛教公论》杂志，为厦门《星光日报》的《弘一法师特刊》题字，还为弘一法师原持有军方所发到各地弘法的特别通行证已满期，须再申领新证一事，写信给国民党师长钱东亮说项。

1938年12月18日晚上，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去南洋宣传抗日救亡的郁达夫，偕同妻子王映霞和儿子郁飞，搭乘英商丰庆轮离开福州前往香港转新加坡。丰庆轮在台湾海峡航行一夜之后，于12月19日抵达厦门。这时距离郁达夫首次过厦还不到两年，但已时过境迁，河山变色；厦门正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着。轮船在离厦门岛约半里的海面停泊一日。郁达夫

凭栏远眺，那美丽的海岛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轮船还没有抵达目的地，他就把万缕心绪化结的心曲倾泻笔端：

“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奸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面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之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寥的死市，我心里虽则也感到了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时的郁达夫，家恨国仇纠缠一身。他的母亲一年前在日寇占领下的家乡饿死；他为之倾注满腔热情的祖国烽火漫天，大片国土沦丧；他自己被反动势力压迫而漂流海外。他的心情多么复杂。然而面对如此逆境，他没有被伤感所压倒，他对祖国抗战前途充满了必胜信念。他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必胜的信念》）令人痛惜的是，当他已看到法西斯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崩溃，就要与祖国人民共享抗战胜利的欢乐时，杀人又吸血的日本宪兵把他秘密杀害了。

1995年11月

丰子恺访厦往事琐谈

不久前在厦大一条街的书店,买到一部久觅不遇的全套六册《护生画集》,喜不待言。阅后得知,画集的第三册,是丰子恺 40 年代末在厦门编绘的。有些往事,记忆犹新,油然浮上脑际。

《护生画集》是一部创作过程长达 46 年、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等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风靡海内外。丰子恺是弘一法师最得意的两位门生(另一位是刘质平)之一。师生俩亲如父子,谊似兄弟。弘一法师 1942 年 10 月病逝泉州时,丰子恺正逃难到贵州遵义,因烽火阻隔,未能到泉州参加葬礼。1948 年,他带了刚从艺专毕业的女儿丰一吟赴台湾旅游,于 11 月 23 日由台湾乘船到厦门,寻访弘一法师的遗踪。弘一法师出家 24 年,在闽南住了十四年,曾 10 次到过厦门。用佛教界人士的话说,这是“与厦门最有缘”。丰子恺抵厦第二天,便由神交已久,刚从新加坡来厦参加传戒大会的广洽法师陪同,到南普陀后山水池区石室兜率陀院,凭吊弘一法师讲律遗址。这时距弘一法师圆寂已六年,人去室空。丰子恺触景生情,无限感慨。当他来到弘一法师在水池旁手植的杨

柳时,更是百感交集,在柳树前伫立多时,默然良久。回到住处后就作画一幅。画面是丰子恺和广洽站在佛堂前柳荫下,丰子恺手扶杨柳的情景,上题:“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字画墨迹,渗透着师生间的深情至意,令人感动。丰子恺将此画赠给广洽法师留念。星移斗转,岁月悠悠。南普陀后山的兜率陀院旧址仍在,景物已非。当年的石室已经改建,辟为餐饮室;水池已被覆盖,老杨柳也已不见其踪。来此品茗小饮的游客,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知道这里曾留下一代高僧念佛弘律的身影。

当年11月28日,丰子恺应厦门佛学会之邀,在虎园路半山塘的寿山岩(岩已废,在白鹭宾馆附近)作了《我与弘一法师》的讲演。那天下午,我曾慕名前往听讲。到达时,一间不大的佛堂已挤得满满,我在后面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丰子恺穿件褐色长袍,面貌清癯,戴一副玳瑁眼镜。丰一吟身着阴丹士林长衫,剪童发。丰子恺在谈了他和弘一法师的关系后,着重讲了他对弘一法师为什么出家的看法。他认为弘一法师出家做和尚,是为了探求人生的究竟。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各人的人生观不同,有的人住在第一层,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就满足了。另有一种人,爬上了二层楼去玩,或者久居